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司法实践为视角

吴秀琳 冼丽红

摘 要**：**刑事和解制度是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的“协商性私立合作模式”。刑事和解的静态构造和动态运行都体现出恢复性正义的价值导向。通过对刑事和解实践的现实数据特征可以析出当前刑事和解制度在主体参与、赔偿数额商定、和解协议履行、和解方式设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此，可以通过刑事和解制度与认罪认罚制度的有效衔接、发挥刑事和解中其他主体的作用、完善创新刑事和解工作的运行与监督机制、探索多元化刑事和解方式等途径予以解决。

关键词：刑事和解；认罪认罚；问题分析；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 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1]](#footnote-0)就逻辑而言，刑事和解通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引入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商谈，从而缓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被害人与加害人的绝对紧张关系，对于定分止争，修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具有正面影响。具体而言，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特别程序，在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彻少捕慎诉司法政策、有效降低审前羁押率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为被害人及时、有效挽回经济损失；二是有利于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三是有利于化解双方矛盾，修复社会关系；四是一定程度上加快诉讼进程，提高办案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五是有效降低上访、申诉等办案风险。然而在实践中受地区发展、社会环境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刑事和解制度的运作也面临着新问题、新情况的挑战。对此，需要在充分分析刑事和解制度基本理论、基本构造的基础上，从实践视角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以促进刑事和解制度不断发展完善。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构造

根据刑事和解的基本定义和法律规定，刑事和解的价值基础是协商性程序正义。协商性程序正义指诉讼参与人通过协商与合意，一方或多方做出放弃某项权利（力）的承诺，以达成诉讼结果对各方利益的最大化。[[2]](#footnote-1)协商性程序正义的提出是刑罚观念转变的结果。刑罚初始被视作犯罪行为所应受的报应，国家通过对犯罪人施加等量或超量的痛苦作为对其的谴责。然而这种强烈的报复色彩和个人主义容易使刑罚成为目的而非工具，进而导致刑罚权的发动缺少限制。随着人文精神的发展，刑罚观念开始转变，刑罚的目的不再是折磨抑或报复，却仅仅在于阻止和预防犯罪，刑罚展现出更多的社会面向。[[3]](#footnote-2)正是基于刑罚观念的转型，协商性程序正义更注重诉讼效果的考量，追求以诉讼修复社会关系的目标，对于完善刑罚权的运用具有积极影响。

在协商性程序正义价值指引下，刑事和解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自愿性原则、平等协商原则、诚实信用原则。[[4]](#footnote-3)自愿性原则是刑事和解的起点。刑事和解的适用必须以诉讼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为基础，由诉讼当事人基于对案件的认识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考量进行自愿选择。在此过程中，公权力机关不得过多干涉，否则将对刑事和解的价值导向造成负面影响。平等协商原则是刑事和解的重点。只有保证参与协商程序的各方处于平等地位，各方主体的真实意愿才能充分表达，相关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切实保障，刑事和解才具有程序上和结果上的正当性。诚实信用原则是刑事和解的保障。刑事和解本质上是一个协商合意活动。加害人通过给予被害人精神抚慰、经济赔偿以取得道义上的谅解和刑罚上的轻处。当协商完成达成合意，该合意应对参与者有共同的拘束力，不得无故轻易反悔。

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特定种类的轻罪、微罪刑事案件。[[5]](#footnote-4)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两类犯罪：第一类是起因于民间纠纷的侵害人身犯罪与侵害财产犯罪，并且要求可能判处的刑罚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类是渎职罪以外可能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6]](#footnote-5)对比以上两类犯罪可见，刑事和解的制度设计对于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准入门槛。就故意犯罪而言，适用刑事和解的基本要件为民间纠纷的起因要件、刑法第四章与第五章的罪行要件、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要件。而过失犯罪仅要求非渎职犯罪的罪行要件与进一步放宽到七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要件。此外，针对故意犯罪，刑诉法规定五年内曾故意犯罪的不能适用刑事和解。刑诉法之所以作此区分主要是考虑到故意犯罪中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压缩了刑事法律对其宽恕的空间。

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包括加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与其他主体。根据主体的不同，刑事和解也可以分为自行和解、民间主体调解、司法机关调解三种类型。

首先，在当事人自行和解的类型中，加害人与被害人是刑事和解的主要参加者。甚言之，这两类主体是刑事和解的主导者。通常来说，和解应当由案件的直接当事人接触、商谈。但对于双方当事人存在客观原因（如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交通肇事案中被害人死亡等）导致无法直接参与和解的，经加害人或被害人同意，可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代为和解。

其次，民间主体调解和司法机关调解的类型中，参与主体则不仅包括双方当事人，还有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居）委会、亲友等。当事人之外的这类主体在刑事和解中更多扮演的是“居间人”的角色。他们为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创造契机，发挥缓和、化解双方矛盾的积极作用，而且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还对和解的进行提供法律帮助并对和解的有效性进行审查。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运行

从宏观上就整个刑事诉讼流程而言，刑事和解制度的动态运行存在若干阶段。目前关于刑事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主要有单一阶段说与复合阶段说。单一阶段说的理论与实践将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限定于审查起诉或审判环节。复合阶段说中的刑事和解则能够适用于从侦查到审判甚至到刑罚执行的整个刑事案件追诉过程。[[7]](#footnote-6)从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公安机关主导的案件侦查阶段、检察机关主导的审查逮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法院主导的审判阶段。在侦查阶段，对于满足适用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公安机关承担的职责是审查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以及在移送审查逮捕、审起诉时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于在前一阶段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需要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时充分考虑公安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理建议。对于在上一阶段当事人尚未提出和解的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建议当事人进行和解。当事人和解的，检察机关在对和解进行自愿性与合法性审查后，可以区分情况分别作出无社会危险性不批准批捕、变更强制措施、不起诉以及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等处理。在审判阶段，人民法院对于在前两个阶段没有和解同时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进行和解。当事人同意和解的，人民法院同样需要进行自愿性与合法性的审查。审查通过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作出从轻处罚、适用非监禁刑、减轻处罚、免予处罚等处理。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当事人刑事和解权利的法律保障是逐层递进的。首先，在侦查阶段，加害人与被害人可以自行达成和解。其次，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可以向加害人与被害人提出进行和解的建议。这时，检察院的刑事和解建议则对相关当事人起到了提醒作用。最后，在审判阶段，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规定对于能够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进行和解。这里公权力机关对于当事人适用刑事和解权利的建议已经由“可以”转变为“应该”，目的就是要使当事人的刑事和解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其进一步的意义与价值在于通过刑事和解制度更多、更好的运用来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达到修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刑事诉讼效果。

二、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现状

（一）刑事和解制度适用概况

根据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通过业务系统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年11月1日至2021年8月24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办结审查逮捕案件共计6695件/11073人，其中批准逮捕、决定逮捕5438件/8831人，不批准逮捕、不予决定逮捕1257件/2242人，分别占办结审查逮捕案件总数的81%和19%。在审查逮捕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不批准逮捕、不予决定逮捕共113件/132人，占办结审查逮捕案件总数的1.7%，占不批准逮捕、不予决定逮捕案件数的9%。

上述统计时段，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办结审查起诉案件14318件/18979人，其中起诉案件10879件/14879人，不起诉案件3368件/4002人。办结的起诉案件、不起诉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共计332件/380人，其中适用刑事和解仍提起公诉的162件/180人、适用刑事和解不起诉的170件/200人。由此，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占起诉、不起诉案件总数的2.3%。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案件中，作出起诉决定、不起诉决定的分别占48.8%、51.2%。适用刑事和解不起诉的案件数占起诉、不起诉案件总数的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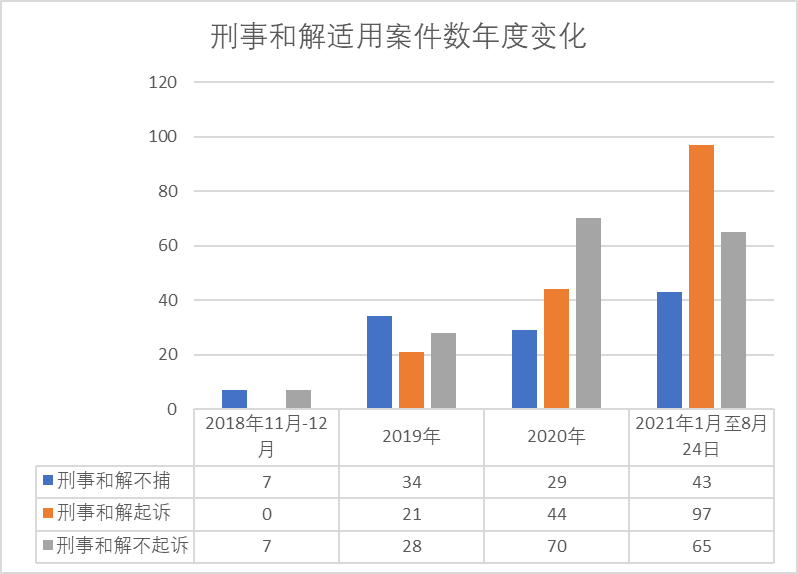
对比审查逮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的数据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案件中，刑事和解的适用率不高。第二，通过适用刑事和解而不起诉的占比低于适用刑事和解不批准逮捕的比率。因此，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进而结案的比率低于审查逮捕阶段。

（二）刑事和解制度适用具体数据分析

第一，关于适用刑事和解案件数量的年度变化。根据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的实践数据，2018年11月至12月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数共有14件/16人，其中适用刑事和解不批准逮捕7件/8人，不起诉7件/8人。2019年全年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共有83件/93人，其中适用刑事和解不批准逮捕34件/39人，提起公诉21件/21人，不起诉28件/33人。2020年全年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共有143件/174人，其中适用刑事和解不批准逮捕29件/38人，提起公诉44件/52人，不起诉70件/84人。2021年1月至8月下旬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共有205件/229人，其中适用刑事和解不批准逮捕43件/47人，提起公诉97件/107人，不起诉65件/75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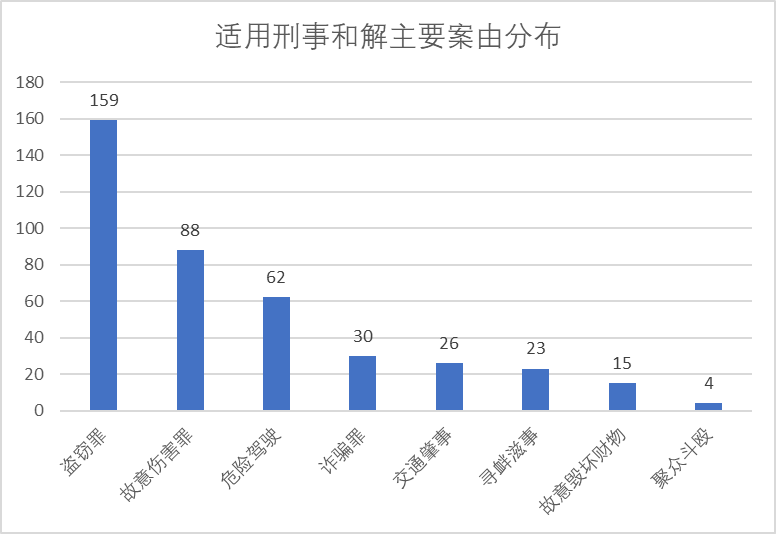
通过以上数据及图1-1可见，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此外，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案件数量的增长幅度大于审查逮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的数量增长。

图1-1



1. 关于刑事和解适用案件类型的分布。根据统计数据，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适用刑事和解的主要案件类型为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危险驾驶罪、诈骗罪、交通肇事罪、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聚众斗殴罪等。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盗窃罪有159件，次之为故意伤害罪88件。数量较少的为故意毁坏财物罪、聚众斗殴罪等。出现此种分布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盗窃罪、故意伤害罪在司法实践中基数较其他类型案件更多，故适用刑事和解的数量也自然高于其他类案件，另一方面也存在罪数竞合后，聚众斗殴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行为按照其他类犯罪处理的因素。

图2-1



第三，关于同时适用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的案件数量。根据统计数据，在审查起诉阶段同时适用刑事和解和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的共有288件/330人，占此阶段中适用刑事和解案件总数的86.7%。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与认罪认罚制度能够做到有效衔接。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问题分析

（一）客观因素制约和解工作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通常在司法人员主持下，加害人和被害人当面进行商谈。但是，近年来利用通讯工具、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持续高发。此类非接触式犯罪频发，而加害人和被害人往往身处不同地区。这类案件的刑事和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地域阻隔的影响。若坚持当事人的接触性协商与办案机关的当面审查，那么刑事和解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无疑会相应增加。这时当事人选择进行刑事和解的意愿无疑会一定程度降低，进而导致刑事和解率的下滑。此外，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因素制约，包括刑事和解在内的刑事诉讼活动为了配合防疫要求往往无法“面对面”进行。这时司法机关在主持刑事和解工作的过程中无法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审查的难度也相应增加。

（二）双方分歧与博弈阻碍和解进行

刑事和解的核心在于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就如何填补被害人损失进行协商与合意。在商谈过程中加害人与被害人更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出发，这时双方当事人可能就和解方案、赔偿数额、赔偿方式等产生意见分歧。例如在赔偿数额方面，在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涉及人身伤害的案件中一些被害人或亲属提出“天价”赔偿数额，一些侵财类案件中被害人提出的赔偿数额远远超过其实际损失。在这些场景中，受害者一方可能会利用加害人处于被刑事追诉的不利地位以及加害人希望通过和解获得刑事司法从宽处理的心理进行要挟或变相要挟，迫使加害人签下“城下之盟”，接受不合理的赔偿要求。[[8]](#footnote-7)在赔偿方式方面，多数被害人对于经济赔偿是希望能够一次性得到完全实现的。但客观情况是加害人往往主观不愿或客观不能一次性履行和解协议达成的赔偿数额。这时双方当事人之间就赔偿款支付方式产生较大分歧，并可能导致和解陷入僵局或落空。此外，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即一些被害人收到赔偿款后不按照和解协议内容出具谅解书，从而可能影响到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从宽处理程度。

刑事和解本身作为实现协商性正义，化解双方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的一项诉讼制度，如果参与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分歧过大反而会使和解参与人的自愿性受挫，进一步破坏目标修复的社会关系，产生新的矛盾。因此，司法机关在刑事和解的实践中要对如何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诉求寻找更好的工作方法。

（三）诚信原则缺位影响和解落实

刑事和解协议的本质是一种合同，它是被害人与加害人“利益”交换的结果。被害人通过给予加害人谅解以获得加害人的赔礼道歉、经济赔偿。加害人通过积极弥补被害人所受损失、表达真诚悔罪的态度以获取刑事诉讼的轻缓处理。刑事和解的达成是双方当事人相向而行的结果，所以刑事和解协议理应对各方产生约束力。[[9]](#footnote-8)在诉讼实务中，当事人反悔总是有理由存在，要么具备正当性，要么不具备正当性，因此不同种的刑事和解反悔的表现也呈现出不同的性质。根据自愿原则，刑事和解的当事人能够通过协商就和解方式、赔偿数额、赔偿方式等事项自愿达成协议，并且在诉讼过程中对从宽处理的方案提出建议。因此，在刑事和解协议履行之前，双方当事人享有反悔的权利。但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当刑事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除存在影响刑事和解协议合法性、自愿性因素外，双方当事人无法做出程序性反悔，也无法使诉讼程序发生回转。[[10]](#footnote-9)

（四）经济赔偿缺乏可操作性指引

关于刑事和解的经济赔偿数额，我国尚未有明确的规定。这种制度规定上的不完善、不明晰直接导致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指引存在瑕疵，这不仅增加了和解过程中程序操作的困难，也会降低刑事和解的司法效率，影响司法公信力。具体而言，刑事和解的经济赔偿数额主要是由加害人和被害人协商确定。司法机关对于最终赔偿数额的确定并没有决定权。这的确体现了刑事和解的自愿性原则。但问题在于，由于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当事人在协商确定赔偿数额时讨价还价的情形经常出现。当事人围绕赔偿数额的商讨过程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开展，降低司法效率。同时，由于缺乏相对明确的数额指引，被害人与加害人最终敲定的赔偿款额可能出现畸高或畸低的现象。此种现象会给社会造成司法公正缺位，“以钱买刑”的消极观感。

（五）和解方式较为单一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方式主要体现为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其中赔偿损失是绝大多数加害人取得被害人谅解进而达成和解的路径，而赔礼道歉往往仅作为一种补充附带于经济性赔偿。这种重经济赔偿而轻精神抚慰的做法使刑事和解制度的恢复性价值受到贬损。[[11]](#footnote-10)具体而言，强调经济赔偿的单一和解方式的负面影响可以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从被害人角度观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其本身往往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残害。虽然经济赔偿能够一定程度缓解被害人痛苦，但物质赔偿并不能完全取代精神抚慰。而且不恰当的物质赔偿反而会进一步对被害人的精神造成二次伤害；第二，从加害人视角观之，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加害人，一味的要求其做出经济赔偿无异于对其施加刑罚。或者有的加害人做出经济赔偿后会消除对被害人的愧疚心理，不利于犯罪人的特殊预防；[[12]](#footnote-11)第三，从整个社会范围而言，刑事和解制度将被进一步视作富人逃逸刑事制裁，“以钱买刑”的特权制度而被诟病和抵制。

四、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

（一）促进刑事和解制度与认罪认罚制度的有效衔接

刑事和解制度与认罪认罚制度是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的两种模式。刑事和解是被害人与加害人两类平等的私权利主体的交互性协商活动，是“协商性的私力合作模式”。认罪认罚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公诉机关这两类主体之间就定罪量刑所进行的商谈活动，是“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作为两种不同的诉讼协商合作模式，在结构定位、案件适用范围、法律效果以及被害人的参与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13]](#footnote-12)但即便如此，由于共同服务于恢复性正义价值，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仍可以形成衔接，搭配运行。

实现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的衔接主要从案件范围、适用条件、结果处理等方面进行。

在案件范围上，认罪认罚可以适用于所有刑事案件，而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则被严格限定在特定的轻罪案件中。由此可见，在逻辑上，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的适用在案件类型上存在交叠。易言之，仅就案件范围而言，刑事和解的适用包含于认罪认罚。基于此，一些不能够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被追诉人也能够通过认罪认罚来求得刑事处罚上的宽缓。通过这种案件范围的衔接可以为被追诉人提供更多悔罪的机会，也给社会关系的修复创造了更多可能。但须注意的是，案件范围的交叠特征并非意味着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就一定可以适用认罪认罚。原因在于两种制度的适用条件也存在衔接问题。

在适用条件上，认罪认罚制度要求被追诉人“认罪”且“认罚”，刑事和解则要求被追诉人“真诚悔罪”。一般情况下，认罪是悔罪的前提。所以当被追诉人“真诚悔罪”时，就可以确定其“认罪认罚”可以同时适用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但就字面意义而言，“认罪”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认识到犯罪的性质及后果，二是认可司法机关对行为所判定的犯罪。在认罪认罚制度中，“认罪”是第二种含义，即认可司法机关所判罪名。因此，即便被追诉人“真诚悔罪”也不能就此认为其符合认罪认罚的适用条件。

在处理结果上，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的效果都是对被追诉人进行从宽处理。其中在量刑上，二者存在较大的衔接空间。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行）》，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可以减少其基准刑的30%以下，刑事和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60%以下，同时具有两种情形的不作重复评价。这里不作重复评价意味着被追诉人既认罪认罚又达成了刑事和解的仅按照认罪认罚或刑事和解一种进行从宽处理。根据情理，这时的从宽处理应当选择更为宽大的一种，即按照刑事和解从宽。

刑事和解制度与认罪认罚制度的有效衔接能够充分发挥“协商性的私力合作模式”与“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的各自优长，共同促进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首先，二者衔接能够一定程度解决刑事和解制度适用案件范围较窄的问题。其次，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的衔接能够区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的认罪、悔罪程度并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从宽处理。最后，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的衔接对恢复社会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二）进一步发挥刑事和解中其他主体作用

根据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能够参与刑事和解的主体除被害人和加害人之外还有司法机关、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居）委会、单位等其他主体。根据这些其他主体是否参与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当事人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14]](#footnote-13)目前，当事人自行和解是刑事和解的主要模式。由当事人选择自行和解充分尊重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利益诉求，保障了和解的自愿性。但是当被害人与加害人有和解意愿却缺乏有效沟通，或者双方就和解方式、赔偿数额等事项存在意见分歧时，当事人自行和解就难以取得良好效果。这时就可以考虑采用司法调解或调解委员会调解等模式。通过引入第三方从中斡旋，可缓和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推动和解进程的合法有序开展。具体来说，可以在刑事和解中引入人民调解员制度，邀请有调解经验、沟通能力的调解员参与和解工作或者在和解工作中发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当事人亲友的积极作用，发挥多方力量，有效促成和解。

（三）完善创新刑事和解工作的运行、监督机制

随着社会发展，刑事和解工作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存在进一步完善的机遇。

首先，对于当事人在不同地区或因客观情况难以亲自到场参加和解的问题，司法机关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和解工作方法进行解决。例如通过视频、微信等方式实现远程和解，并通过同步录音录像的形式记录和解过程。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就曾利用微信视频、微信群组会议等新形式主持了钟某甲、钟某乙涉嫌诈骗案等案件，并促成了双方和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其次，对于赔偿数额缺乏统一标准造成司法不公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完善刑事和解经济赔偿标准的立法。通过立法将经济赔偿的数额依据不同的案件类型、加害人的认罪悔过态度以及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进行梯度化设置，防止出现经济赔偿数额超出合理限度以及“同案不同额”的现象。另一方面，在立法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可以参照民事、行政的赔偿标准指导刑事和解的经济赔偿数额。

再次，对于刑事和解过程中出现的反悔问题，司法机关要区分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原因在法律框架内分情况处理。例如在审查起诉阶段，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反悔的，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刑事和解协议符合自愿性、合法性要求且已履行完毕的，不允许当事人反悔，并根据案件性质依法作出处理。而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和解协议违背自愿性、合法性原则的或者符合以上原则但尚未履行的，允许当事人反悔并保障当事人继续选择和解的权利。

最后，由于刑事和解制度规定上存在模糊之处，容易在具体实践中留下权力寻租空间，所以刑事和解工作需要加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利用案件评查等机制监督、制约公权力，防止滋生司法腐败。

（四）探索多元化刑事和解方式

当前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方式主要是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往往同时遭受了物质损失和精神创伤。虽然在经济和物质上对被害人进行赔偿能够一定程度缓解被害人的愤慨、痛苦情绪，但不能做到对被害人精神创伤的抚慰。且有研究表明，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最希望得到的不是物质赔偿，而是精神压力的释放。[[15]](#footnote-14)因此，刑事和解应当摒除“重物质赔偿，轻精神抚慰”的理念，推进刑事和解方式的多元化。

而推进刑事和解方式的多元化一方面要重视赔礼道歉的运用，另一方面要探索新的和解方式。目前法律明确规定的刑事和解方式是经济赔偿和赔礼道歉。赔礼道歉作为加害人向被害人表示歉疚的重要方式，能够传递加害人请求被害人谅解的真诚态度。这种态度对于被害人放下心理包袱，释放负面情绪有重要作用。而且赔礼道歉也验证了加害人真诚悔罪的主观认识。因此，在之后的刑事和解实践中应逐步提高赔礼道歉的地位。加害人仅承诺给予经济赔偿却拒绝赔礼道歉的，不能进行刑事和解，或者降低对其从宽处理的程度。

探索多元化的和解方式需要在赔礼道歉之外，允许加害人通过义务参加社区劳动、投身社会慈善、主动承担被害人受伤的照顾工作等取得被害人谅解。同时，对司法机关而言，可以创新工作方式，通过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联合调解等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如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北滘检察室在办理崔某仕盗窃案过程中，通过“检调对接”平台前移侦查阶段，由检察机关联合警调中心主持案件和解并最终促成和解达成，充分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1. 陈光中：《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第5页。 [↑](#footnote-ref-0)
2. 参见陈瑞华：《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第3页。 [↑](#footnote-ref-1)
3. 参见[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footnote-ref-2)
4. 参见王新清：《合意式刑事诉讼论》，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162页。 [↑](#footnote-ref-3)
5. 参见陈学泉：《我国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面临的挑战及应对》，载《法学杂志》2015年第4期，第54页。 [↑](#footnote-ref-4)
6.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footnote-ref-5)
7. 参见肖文桂：《刑事和解适用问题及其解决思路》，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5期，第87页。 [↑](#footnote-ref-6)
8. 参见杨浩：《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与重构》，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5期，第121页。 [↑](#footnote-ref-7)
9. 参见王新清：《合意式刑事诉讼论》，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163页。 [↑](#footnote-ref-8)
10. 参见陈瑞华：《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第3页。 [↑](#footnote-ref-9)
11. 参见姜敏：《刑事和解：中国刑事司法从报应正义向恢复正义转型的路径》，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5期，第167页。 [↑](#footnote-ref-10)
12. 参见肖文桂：《刑事和解适用问题及其解决思路》，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5期，第86-87页。 [↑](#footnote-ref-11)
13. 参见何剑：《认罪认罚从宽与刑事和解制度比较研究》，载《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10期，第102-103页；李佳威：《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被害人参与：兼议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区分与衔接》，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78-79页。 [↑](#footnote-ref-12)
14.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16-19页。 [↑](#footnote-ref-13)
15. 参见姜敏：《刑事和解：中国刑事司法从报应正义向恢复正义转型的路径第》，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5期，167页。 [↑](#footnote-ref-14)